

大學教授的言責



棟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策劃

D675.809
2010/10

《張忠棟文集》二

《大學教授的言責》

《張忠棟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策劃



《張忠棟文集》總序

就在人類即將共同步入新世紀的前夕，當代台灣自由主義的鬥士：張忠棟教授，身抗多年病魔的侵犯，精竭力乏，竟不幸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一日齋志而歿，未可與我們共同瞻望新世紀的曙光，惟僅長留精神典範於人間。

身為一代自由主義者，張忠棟的一生，是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者艱難歷程的辯證繼承。張忠棟透過自身的學術研究，對於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先行者的關懷所在與努力所求，有著精深的描摹和刻畫。尤有進者，他戮力以赴的辛勤探索，不是學院派知識分子埋首書齋或象牙塔裡善為易使的智力遊戲，而是和人的生命、價值與尊嚴相契深結的精神召喚。張忠棟不是與世無涉、毫無人類具體關懷的學究；他的學術研究，寄寓著深層的終極關懷之意義，不僅為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的歷史命運，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也是他個人寄託所嚮與奮鬥所祈的歷史根源。他從前一世代的自由主義者身上，建構了自我認同的依據；更在他們常常就此止步的行動實

踐層次上，以具體的關懷與行動，和台灣本土相連共持，超越前輩，展現現代台灣自由主義歷史命運的光明遠景。

張忠棟的生命史，和廿世紀下半葉長處於風雨飄搖之間的台灣，緊密相連。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國際局勢的變易撼動下，台灣被迫進入了前此未有的關鍵時刻。他本乎知識分子應有的言論責任，開展了筆耕事業，為促成台灣人民共持攜手，渡過難關，提供了許多觀念性的見解。在同一時段，台灣也正面臨必須邁向民主、挑戰威權體制的多事之秋。然而，主張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民主化之路的必要裝備和程序，並不能見容於統治當局，壓制、迫害的陰影，如影隨形。在這樣的背景下，張忠棟由於深切關懷本土的美好前景，毅然挺身而出，慷慨陳詞，為台灣的轉型之路，做出了歷史見證。

隨著台灣艱辛地轉型易態，在形式上逐漸步入現代多元社會的軌跡，知識分子更應扮演推動她在精神倫理層域裡徹底實質轉型的工程師。張忠棟在言論、觀念層次裡，鼓動風潮，帶動新局，眾所廣知同欽；他並身體力行，積極參與各種力促台灣走向美好未來的社會、政治團體，以群體的組合力量，向民主、自由、平等的時代轉型前趨直行。張忠棟先後在澄社、台灣大學教授聯誼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歷史學會、「『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現已易名為「『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民主進步黨等團體，留下的深刻印記，永銘人心，無愧青史。

在另一個千禧年已經開始的時分，那些做為「人」的永恒

問題，那些做為台灣人的現實挑戰，仍無或已時。整體人類的前景何在？台灣在新世紀裡的位置如何？不斷累疊的塵埃積澱，可能遮掩我們探根究底，找尋出路與定位的慧眼。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角色，顯然是多重的。他必須衝決網羅，立足民族與鄉土，既為整體人類生存意義的問題，也為台灣因應世局的衝擊，在觀念啓蒙和行動實踐的領域，交互層疊，做出恰如其分的抉擇與貢獻。斯人已遠，張忠棟身體力行，不輟無悔，奮勇刻鏤的生命／歷史軌跡，正是後繼者可以取掘法式的重要思想／精神資源之一。

為了讓張忠棟教授用生命為代價所提出的思考，可以伴隨著人類永遠直路而行，謹以恭思追懷之心，推出《張忠棟文集》。這套《張忠棟文集》擬匯總張忠棟生前發表過的一切文字，以類相從，分冊輯編，希望能完整保存張忠棟思想足跡的紀錄，也希望為人們探究張忠棟生命軌跡的歷史意義，提供充分的素材。張忠棟生命道路的光與熱，必將永遠照耀與溫暖著我們。

這套《張忠棟文集》的編輯工程，得以竣事，首先必須感謝張忠棟的家屬：夫人林真真女士、公子張益嘉先生，賢弟張忠本先生的同意與支持。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為編輯工作的開展，提供無數助力，自應感謝該基金會的第一、二屆諸董事：李永熾、林正弘、陳宏正、李明仁、劉季倫、袁韻璧、薛化元、顏伯川與潘光哲等女士先生的慷慨允諾。提調督導編印這套

《張忠棟文集》的全程工作，尤賴於薛化元與潘光哲先生之獻力；全書得以順利印行面世，亦需感謝稻鄉出版社的協助。允晨出版公司、聯經出版公司與自立報系出版部慨允出讓張忠棟著作的出版權，更需謹此敬致謝忱。希望這套《張忠棟文集》的問世，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而深刻的認識與思索張忠棟的觀念遺產。

《張忠棟文集》編輯委員會 敬上

2005年6月11日

序——

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之旅

陳師孟

我保存著一封忠棟兄的親筆信，這是他寫給我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後一封，其實就是唯一的一封，一直捨不得丟。今天翻出來展讀：

報告：本黨大勝，主席膨風，說明年縣市長選舉要拿下一半席位，看來三年以後本黨非執政不可。說正經話，台灣的轉變今後會加快進行，是福是禍，難以預料。我們在台灣既不能置身事外，便非盡力不可。

在這次選舉中，我也出去講了若干場。國民黨的金牛慘敗、地方角頭慘敗，足見台灣選民的進步；但是新國民黨連線之類的人物紛紛當選，又似乎是選民的不夠

成熟。有人認為這表示，國民黨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外省人強烈排斥他們的本省候選人，反對本土化，而本省人並不那樣排斥外省同志，這種看法似不無道理。無論如可，國民黨的權力鬥爭確有強烈的省籍情結；反觀本黨，則在大呼族群融合。省籍族群問題處理的成敗，也許正是兩黨未來命運的關鍵所在。

忠棟 上 1993 .1. 3

那時我才卸下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務不久，在美國東岸做訪問學人，這封報捷的信，一開始讀得出忠棟兄的俏皮與開心、接下來就讀出他對台灣未來的關心；開心與關心都很自然，但在十多年後讀來最令人驚異的，是他對台灣未來命運之關鍵所在，有如此精準的預判；正由於國民黨這些年成功地處理了黨內的省籍鬥爭，即使不便直言外省精英在本質上的優越性或法統上的正當性，也一再凸顯外省權貴在兩岸政經接軌時的樞紐性，而民進黨卻始終停留在「大呼融合」的階段，被「福佬沙文主義」的黑鍋弄得畏首畏尾，將族群議題的陰暗角落視為禁忌，遂有今日之積弱不振。

忠棟兄在此之前的1991年，邀我同日加入民進黨，除了有意要破除民進黨省籍歧視的污名，也是因為對中國國民黨長期失望所致。收集在這套文集中的百餘篇文字，記錄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之旅。這些文字最早起自1972年台美關係出現遽變時，忠棟兄見識到「許多朋友一下換了嘴臉，叫人看了真不舒

服」，不用說，這些朋友當然多半是些平日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高級知識份子，在蔣家獨裁下忠黨愛國、唯諾奉承，一旦專制政權面臨國際現實的挑戰，立即做出「識時務」的自我調整，對共產中國開始透露曖昧情愫。其實反共也好、親中也罷，不過是從一個威權挪到另一個威權的押寶，也都是對個人自由的糟蹋與對民主價值的背叛。身為一個自由主義的信仰者、也是一個百年樹人的教育工作者，忠棟兄不齒於這種機會主義的歪風固不待言，但令他「孰不可忍」的，應是這些人對自由主義名號的褻瀆與對知識份子身份的冒用，在他看來，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最大特色乃是與政治權威的對立，不管權威在那一個極端。可以想見，當這種「叫人真不舒服」的人與事逐漸累積到了臨界點，他的如椽之筆就再也無法停頓，從此在教學研究之餘，開始了長達十數年的政治評論生涯。如他所景仰的自由主義者胡適、傅斯年、殷海光、夏道平等諸先生，無一不是兩棲於學術與政治的交集領域，忠棟兄起而效尤，悠遊學海、縱橫政論，為後世留下珍貴的思想遺產與學者典範。

當然，教育界與知識界的諸多沈痾痼疾，還只是衍生的、表相的，台灣知識份子墮落的源頭，毫無疑問要追溯到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戒嚴體制下的校園中，獨立思考、挑戰威權是最危險的個性，是國民黨欲除之而後快的。忠棟兄顯然沒有絲毫畏縮，1980年代起反而把批判對象日益集中到國民黨政

權頭上。不但下筆激烈的程度升高，而且由「坐而言」進而「起而行」，公然支持「黨外人士」不說，又罔顧當時對設置教師團體的禁令，發起籌組「台大教授聯誼會」，引起國民黨極度不安而全力打壓。就是在這次事件中，我躬逢其盛而找到一位亦師亦友的老大哥，他把國民黨的威迫利誘一概當成玩笑，我自然也抗拒得了家族長輩與系上老師的告誡。最後眼看著我們勢將突破禁令，國民黨知青黨部不得不對台大的黨棍教授下達動員令，用「人海戰術」集體申請入會，演出丟人現眼的顛覆戲碼，也種下我們日後連袂退出國民黨的遠因。

此後忠棟兄陸續參加「澄社」、「台灣教授協會」、「『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之類的「非法組織」或「叛亂團體」，我亦步亦趨，不敢脫隊；至於任務型的「100行動聯盟」則是由我發動，他抱病參與靜坐，嚐到被鎮暴警察驅散的滋味。其實我們在這些團體中往往沒有經常性的工作接觸或搭檔關係，但兩人同時參與，彷彿對彼此都是一種無形的鼓舞，一種做對了事的保證。特別是我，由對政治的「不知不覺」到「後知後覺」，忠棟兄的一路相伴，讓我每跨出新的一步，得以免去猶疑摸索的困擾。加入民進黨就是最好的例子，忠棟兄能灑脫地放下學界地位與社會清譽，我又有何顧忌？

忠棟兄在世紀之交的半年前，走完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之旅，沒有親眼見到國民黨狼狽交出政權，當然更沒有經歷到八年後國民黨囂張的復辟，但他早先信中有謂「台灣的轉變會加

速進行，是福是禍、難以預料」，或許他在臨去前心中存著一種心平氣和，不因為還沒有見到心血開花結果而失望、也不因為花謝果落而悵然；杭廷頓的「第三波」早有警告，新興民主國家的宿命是動盪不安的，往往民主化的浪潮捲起時，反撲的逆浪也已孕育。不論如何，台灣的民主路途還在往下走，沒有人能確定未來的結局如何，沒有人能看盡世事。所以不必太計較瞋目的剎那如何景象，該計較的是短暫人生旅途中，是否依良知而行，其他都交給未來的歷史。我想到忠棟兄說他喜愛的那則小故事：

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清·周櫟園·《書影》）。

這是一則刻意不給結局的故事，卻給了我們無限的想像空間：這隻鸚鵡到底在想什麼呢？水滴灑落在大火上，會有什麼作用嗎？如果不會，最後為什麼不明說呢？又何必講這麼一個果然如此的故事呢？如果火真被澆熄了，該不會只是歸之於一個無可解釋的奇跡吧？會不會是因為山中其他的飛禽走獸被鸚鵡感動，於是大家都同心協力的結果？至少我最喜歡做這樣的想像。忠棟兄或許不認為憑自己有限的個人能改變些什麼，但當他奮力向前時，我毋寧相信，他看到的是追隨著他腳步的一群接棒者，那其中有我。

《張忠棟文集》編輯凡例

- 一、《張忠棟文集》以匯總張忠棟生前發表過的一切著作爲目標。凡其著述生前已集結爲專書者，皆據原書樣態，分冊精校重版；未集結之文字，以類相從，另行輯編，分冊出版。
- 二、《張忠棟文集》收錄之文獻，均於文末註明資料來源與初刊時間；以筆名發表者，另行標註。原文有作者自行題記撰述時間、地點者，悉據原來格式。本書收錄之文獻，均據原刊形態；個別文字與標點符號等，如有原來排印訛誤者，逕予改正；有重大訛誤者，由編者添加校註說明。
- 三、《張忠棟文集》收錄之文獻，原文註解，均採隨頁註格式。未說明者，均爲作者原註。編者所加註解，另行註明爲「編註」。
- 四、《張忠棟文集》收錄之學術性質著作，均由編者另編索引，附於該冊書末，以便檢索。
- 五、《張忠棟文集》採取橫排格式。如原文爲直排者，行文裡可能出現的「左列」、「右列」等字樣，悉據原文格式。

- 六、張忠棟生前刊佈之論述，浩瀚繁多，編者則就掌握所及，另行編纂〈張忠棟著述目錄〉，依時排序，並與其他相關研究參考資料，匯為一帙，列為《張忠棟文集》附卷，以便參考利用。
- 七、纂輯《張忠棟文集》的目標之一，在為提供學界研究之便利。然而，張忠棟已發表之著述，繁多難數，查覈匪易；文獻之分類、排序，亦容或見仁見智。且時日匆促，清校編印，實難免錯訛誤失。敬祈 學界方家多予指正。

大學教授的言責

（代 序）*

春秋鄭國子產有一句「防民之口難於防川」的名言，大意是說政府不可堵塞言路，反對批評，否則的話，人民的積怨在心，一旦爆發出來，必如河堤潰決，不可收拾。從另一方面說，人民如果愛護國家、愛護政府，也應該隨時隨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在國家有了困難時，尤應善盡言責，不可落井下石，發表偏激搗亂的論調。

一般人民不一定都有發表意見的能力。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最該經常提出意見來督促政府的有三類人：民意代表定期集會，應該利用質詢施政的機會，糾正政府的錯誤；新聞

* 本文原載：《綜合月刊》，期60（1973年11月）——編註。

記者每天寫新聞、寫社論，也有很多機會發掘問題；再來就是大學教授，他們可以寫文章，或者發表演講，討論關係國家前途的事情。

比較起來，大學教授有時尤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大學教授有專門的知識，也受過方法和思考訓練，在針對同一事件提出意見和批評的時候，民意代表和新聞記者可以只着眼於一時的利害，只着眼於責任誰屬的問題，大學教授却該進一層設想，從比較長遠的觀點來探討它對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影響，提出建設性的改善之道。

舉美國的水門事件為例，美國議員和記者不斷追查尼克森事前知不知道共和黨偷竊民主黨文件的行動？事後是否參與掩飾這件事的行為？美國的大學教授就該研究這件事的可能影響：尼克森在內政方面的作為今後是否會受到限制？尼克森的外交行動會不會受水門事件的影響？美國的政治會不會發生重大的危機？有沒有避免或解決的辦法？今後美國的選舉制度應該如何改善？這類問題大學教授都該深入探討。換而言之，民意代表和新聞記者在討論批評一件事的時候，可以只追究事實；大學教授則尤須兼重事理的研究和分析。唯其如此，大學教授的意見才往往更有說服的力量。

大學教授在批評時政、提供意見的工作中既然如此重要，且不妨看我們的教授從民國以來的貢獻如何。民國初年，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要求，日本又在巴黎和會謀取山東

半島的利益，當時幾位教授登高一呼，全國青年群起響應，演成愛國的五四運動，使得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不敢在和約上簽字。九一八事變後，北平的大學教授紛紛提出救亡圖存的意見，向政府指出在外交和內政上應該努力的方向，像蔣廷黻當時在《獨立評論》上寫的文章，在今天讀來猶覺肝膽照人，擲地有聲。抗戰期間，若干知名教授參加參政會，向政府提供了救國的意見。傅斯年當時一面能夠不畏權勢，揭發中央銀行國庫局的貪污案，又能獨排眾議，寫成〈黃禍〉一文，擁護政府徵收中央銀行黃金存戶的一部分黃金。這些只是一些比較突出的例子。從五四到抗戰勝利，大學教授或者演講，或者在報紙上寫文章，或者集合在一起辦討論時政的刊物，或者實際在政府中參預糾彈的工作，多能善盡言責，為國家前途提供寶貴的意見，改正政府的若干失策。

抗戰後期，共產黨擴大背叛政府的活動，若干大學教授竟不能善用他們的分析能力，甘受共黨驅策，作出許多故意打擊政府的勾當。從此政府和大學教授之間的疑忌漸生。大陸淪陷了，政府遷來臺灣，大學教授們日益消沉，少數幾個人偶然發表評論，又多半充滿一股怨懟之氣，很少再有殷切關愛國家的情懷。今天我們的局面在經濟上也許可算達到了小康，但是地面小，人力薄弱，這兩年又在外交上日趨孤立，這中間的艱難困苦已不亞於當年在大陸上最惡劣的時期。此時此地，大家正該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然而，多數大學教

授還是關在學術的象牙塔裡，很少人願意出來慷慨陳詞，把救國的道理說個痛快透切，激勵士氣，鼓舞人心。

大學教授不肯出來發言的理由很多。首先是他們自謙對於現實問題沒有成熟的見解，不便發言，以免貽笑大方。其實，大學教授對現實問題有無見解，並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爲不爲的問題。大家只要關心現實問題，找出其中和自己所學有關的，動手搜集一點資料，利用平日研究學問的方法來思考，做一點分析工作，相信都會有收穫，形成高明的見解，發表出來，對國家社會就是一份良好的貢獻。

不少大學教授有中國士人「隱」的傳統，他們不求聞達，不肯表現自己，認爲那樣有沽名釣譽的嫌疑。但是今天國家的處境如此，每一個人拿出全部的力量來救國猶恐不足，豈能獨容受過高級知識訓練的大學教授退避？至於挺身而出，公開發表言論，只要自問目的是在救國，別無其他，就不必再有旁的顧慮，不必關心他人的反應。「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熱心愛國，就應該懷抱這樣大無畏的精神。

大學教授不肯輕談國事的最大藉口，就是就心政府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政府和大學教授之間的疑忌已久，過去大學教授的言論的確也曾受到干預，這些情況之所以形成，政府有失策的地方，大學教授言論輕率，用語刻薄，甚至用心不善，也有很大的關係。今天政府既然標榜大有爲，政府領導人士並一再鼓勵大家提供意見，只要大學教授能够深思熟